

我国对外文化战略和政策略析

梁 斌

[摘要]进入21世纪以来,对外文化交流发挥的软实力优势在国家对外事务中日益凸显,逐渐形成了“政府统筹、社会参与、官民并举、市场运作”的对外文化交流格局,我国的对外文化工作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历史时期。但对外文化战略却还未能以独立的形态出现,对外文化政策也未形成体系,这制约了对外文化工作的管理效率。为更好地发挥对外文化工作的积极作用,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必须尽快做好顶层设计,制定对外文化战略已成为当务之急。

[关键词]对外文化工作;战略;外交

[中图分类号] G1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5-8273(2015)05-0016-06

当前,我国的对外文化工作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历史时期,无论是国家对其重视程度,还是文化交流的规模质量,都达到历史新高。对外文化交流开展得生机勃勃,工作手段日益丰富,交流渠道更加多样,在国家对外事务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为社会各界所认识和重视。较之于日益发展的对外文化工作实践,与之相应的对外文化战略却还未能以独立的形态出现,而只是作为国家对外事务的一部分体现在整体外交战略之中,或者作为国家文化事务的一部分见诸国家文化发展规划中。从操作层面看,我国的对外文化政策也未形成体系,而是散见于各种文件中,这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对外文化工作的管理效率。

一、对外文化战略和政策缺位的 原因分析

之所以出现上述战略缺位和政策缺失现象,可能有两个方面的原因:

第一,我国的文化管理职能比较分散,管理上的条块分割致使未能形成统一有效的对

外文化战略和政策。

从相对狭义的文化概念而言,我国的文化管理格局由文化、广播影视、新闻出版等多个部门组成,职能既有交叉,也有重叠;若从更广义的文化概念看,则更加分散,目前约有10多个国家部委局办在分头管理一定领域的文化事务。对外文化工作因其外事特殊性,历来由专门的机构负责归口管理,但也历经变迁。1949年11月,文化部设立对外文化联络事务局。1951年,该局改由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领导,1955年,改名为对外文化联络局。1958年3月,国家对外文化联络局改组为国家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直属于国务院,1968年撤销。1978年9月,国务院决定由文化部归口管理对外文化交流工作。1981年3月6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决定恢复设立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1982年5月,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定对外文委并入文化部。按照会议决定,文化部负责全国对外文化交流工作的归口管理,文化部对外文化联络局是文化部履行上述职责的外事工作机构。由一个局级机

作者:梁斌,文化部外联局传播处处长。

构来牵头负责分散在众多部级机构中的对外文化事务,注定了工作的低效率和低执行率。尽管1993年中办、国办转发了文化部关于全国对外文化交流工作归口管理办法,2000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全国外事管理工作若干规定》,再次明确文化部归口管理全国的对外文化交流工作职能,但行政权力的隶属关系不变,所谓的归口管理也往往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效果大打折扣。

进入21世纪后,随着对外文化交流领域和渠道的不断拓展,越来越多的部门和机构参与其中,既有政府部门和机构,也有社会组织、企业以及很多个人,逐步形成了主体多元、层次丰富、领域广泛的对外文化交流新局面。为进一步加强对外文化工作的组织指导,增进有关中央管理部门之间的协调沟通、协调配合,促进资源整合、优势互补,形成一盘棋局面,2009年,经国务院批准,文化部牵头成立了对外文化工作部际联席会议制度,由中央防范处理邪教办、外交部、教育部、国家民委、商务部、文化部、广电总局、新闻出版总署、体育总局、旅游局、侨办、文物局等12家部委局办组成。该机构的成立,有效统筹了全国对外文化工作资源,对于推动全国对外文化工作实现跨越式发展,提高文化开放水平,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发挥了重要作用。但这毕竟是一个松散的机构,其协调能力和执行力都受到方方面面的制约,根据现有的政府体制架构,想通过这样的组织制度解决国家层面的对外文化战略问题,道路既阻且长。

第二,对对外文化工作在国家对外事务中重要性的认识,是一个观念逐步转变的过程,只有国家层面重视了,才有可能出台有高度的大视野战略决策。

长期以来,我国的对外文化工作一直是作为国家整体外交的一部分来执行的,处于次要的、辅助性地位。由起初的依附于国家外交工作,发展到成为具有自身特色的重要事业,与国际国内形势的发展变化密切相关。

在冷战时期,对外文化工作从属于政治外交、军事外交,当时的对外文化工作是作为政治斗争的工具来开展的,尤其突出其宣传功

能,目的在于辅助政治和军事外交的战略需要。这样的对外文化工作自然很难形成自己的特色。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党和政府强调了文化在国家建设中的作用,对外文化工作才渐渐受到重视。但这一时期的对外文化交流的规模十分有限,且基本上都限于官方交流。

1986年,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指出:“近代世界和中国的历史都表明,拒绝接受外国的先进科学文化,任何国家任何民族要发展进步都是不可能的。闭关自守只能停滞落后……对外开放作为一项不可动摇的基本国策,不仅适用于物质文明建设,而且适用于精神文明建设。”从此,政府开始将文化纳入对外开放的大格局中。1997年党的十五大报告又重申了这一思想:“要坚持平等互利的原则,同世界各国和地区广泛开展贸易往来、经济技术合作和科学文化交流,促进共同发展。”要“开展多种形式的对外文化交流,博采各国文化之长,向世界展示中国文化建设的成就”。在上述精神指导下,这一时期的对外文化交流无论是规模还是质量都有了新的提高。在走出国门开展文化交流的同时,在国内诞生了中国国际钢琴比赛(1994年首届)、中国国际声乐比赛(2000年首届)、亚洲艺术节(1998年首届)、上海国际艺术节(1999年首届)、“相约北京”联欢活动(2000年首届)等重大国际文化艺术活动。发展到今天,这些项目都成了我国开展对外文化交流的重要品牌。

进入21世纪后,对外文化工作出现了新的发展势头。这一时期,中国的文化外交逐步显现出其迷人的风采。2001年,中法两国政府达成协议,决定于2003年10月至2004年7月在法国举办中国文化年活动,2004年10月至2005年7月在中国举办法国文化年活动。中法文化年涉及了多领域的广泛交流,举办的大小项目达到300多个,史无前例,成为中外文化交流的典范。此后不久,中俄之间互办了国家年,之后,中国陆续与意大利、澳大利亚、土耳其、南非等多个国家互办了文化年等大型文化交流活动。2005年,中美合作在美国举办

了大规模的“中国文化节”。2012年,为庆祝中德建交40周年,中德两国合作在德国举办了为期一年的“中国文化年”系列活动。举办文化年、文化节、文化季,成为中国文化外交的新常态。

与此同时,中央加强了对对外文化工作的重视。2006年,中央第一次外事工作会议提出“要大力开展对外文化交流,深化对外文化体制改革,实施对外文化精品战略,扩大文化产品出口,搞好对外宣传,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走向世界,让世界更多更好地了解中国”。2007年,党的十七大报告首次提出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并提出“加强对外文化交流,吸收各国优秀文明成果,增强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2011年,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 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突出强调了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的重要意义,将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作为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构建有利于文化繁荣发展体制机制的重要举措之一,提出实施文化走出去工程,完善支持文化产品和服务走出去的政策措施;构建人文交流机制,把政府交流和民间交流结合起来,发挥非公有制文化企业、文化非营利机构在对外文化交流中的作用,支持海外侨胞积极开展中外人文交流。从中可以看出,中央对开展对外文化工作的指导更加明确具体。2012年,国家“十二五”时期文化改革发展规划纲要中提出: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是不断增强我国文化软实力和国际竞争力,提升综合国力的客观要求;推动文化产品和服务的出口,扩大文化企业对外投资和跨国经营,是支持和推动文化走出去的重要方式;国家将鼓励扩大文化产品和服务的出口规模,推动开拓国际市场,逐步改变主要文化产品进出口严重逆差的局面,并扶持重点文化企业的海外发展。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进一步提出,坚持政府主导、企业主体、市场运作、社会参与,扩大对外文化交流,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和对外话语体系建设,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理顺内宣外宣体制,支持重点媒体面向国内国际发展;培育外向型文化企业,支持文化企业到境外开拓市场;鼓励社会组织、中资机构等

参与孔子学院和海外文化中心建设,承担人文交流项目。从上述几次会议和文件可以看出,2006年以来,党和政府不断加大对对外文化工作的重视和指导,而这一时期的对外文化工作也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在这一态势下,一个具有全局意义的中国对外文化战略已经可以提到议事日程上来。

二、当前我国对外文化工作的政策和举措

近年来,在党中央、国务院的领导下,对外文化交流事业不断发展壮大,由从属走向独立,其软实力优势在对外事务中日益凸显。政府主管部门对外文化工作的发展和布局思路逐渐明晰,逐渐形成了“政府统筹、社会参与、官民并举、市场运作”的对外文化交流基本原则,同时牢牢把握国内国外两个大局,综合运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在内容和方式上坚持“继承传统、突出当代,中国元素、国际表达”。

(一)在政策上,从管理向引导扶持转变,引导全民更好地开展对外文化交流

一是简化对外文化交流审批程序。长期以来,我国对对外文化交流实行严格的外事审批制度,虽然规范了对外文化交流活动,但也影响了文化交流的效率。为了方便全社会参与对外文化交流,积极推动中国文化走出去,经国务院批准,文化部于2001、2006年向地方文化厅局先后两批下放出国艺术团组和展览的审批权限,逐步减少了文化团组出国交流的审批环节。尽管审批权限的下放力度有限,但这为今后进一步完善对外文化交流管理方式做了尝试。此外,对于境外来华的营业性文化演出项目,则通过《营业性演出管理条例》来调整,使得该领域的管理走上法治道路。

二是加强政策扶持。2014年3月,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快发展对外文化贸易的意见》,对加快发展对外文化贸易、推动文化产品和服务出口做出全面部署。《意见》在现行政策的基础上,从4个方面、15个分类全面系统地提出了支持对外文化贸易发展的政策措施。2013年年

底成立的国家艺术基金资助范围包括艺术的创作生产、传播交流推广、征集收藏、人才培养等方面,对符合条件的对外文化交流项目予以资金支持。

三是加强政策引导。比如我国选手参加国际艺术比赛,政府曾一度负责挑选选手、组团出国并负担选手出国参赛的所有费用。为转变政府职能,宏观指导和科学管理我国艺术团组及个人出国参加各类国际艺术比赛,推动我国文化艺术事业的繁荣与发展,文化部于2006年出台政策,决定对我国艺术团组及个人出国参加国际艺术比赛的管理模式进行改革,此后将不再出资组团和选派选手出国参赛,而是采取定期公布鼓励参加的国际艺术比赛目录,并根据选手获奖成绩按照规定发放参赛经费补贴方式进行管理。这一政策的实施,较好地引导了国内选手参加有含金量的国际艺术比赛,获奖后给予补贴也在更大程度上惠及了更多的参赛选手,因此政策出台后,得到了社会舆论的积极反馈。

此外,针对近年来国内一些艺术团组和社会团体赴维也纳金色大厅等国外“著名”演展场所进行海外“镀金”的现象,文化部于2014年7月印发《关于坚决制止国内艺术团组赴国外“镀金”的通知》,对国内各级各类艺术团组到金色大厅等国外著名演展场所或国际组织总部办公场所进行“镀金”性质演展活动予以坚决制止。这一通知在一定程度上向社会澄清了国外知名演展场所的实际含金量所在,对于国内舆论进行了正确引导,鼓励高质量的艺术团组走进国外的演出季等有较高含金量的舞台,对于促进国内文艺事业发展具有积极意义。

(二)塑造对外文化交流品牌,积极搭建文化走出去平台

近年来,政府主管部门不遗余力地在海外开拓文化交流平台,建设多种交流渠道。在海外设立中国文化中心就是其中一项重要举措。文化中心是一国政府在对方国开设的正规交流平台,是展示本国文化的重要窗口,是双边关系进一步深化的重要标志,旨在加强两国文化交流与合作,增进两国人民之间的相互了

解和友谊。中国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在海外设立文化中心,近10年发展较快,迄今为止,已在非洲、欧洲、亚洲和美洲建成共20个中国文化中心。按照国务院批复的《海外中国文化中心发展规划(2012—2020)》,到2020年将建成50个海外中国文化中心。未来几年,每年平均新建5个中国文化中心,这必将有利于加快海外文化传播阵地的布局。

文化部从2001年开始打造“春节品牌”活动,每年派遣文艺团组赴伦敦、巴黎、纽约、曼谷和悉尼等地参与当地春节庆祝活动。2008、2009年,中国侨联和国侨办也分别启动“五洲同春”、“四海同春”等文化慰侨活动,参与共同打造春节文化品牌。这些春节文化交流活动受到了广大海外观众的欢迎,也得到了中央领导的高度重视。2009年,时任国务委员刘延东亲自把这些由不同部门举办的海外春节文化活动统一命名为“欢乐春节”。自2010年春节开始,文化部会同国家相关部委、各地文化团体和驻外机构在海外共同推出“欢乐春节”大型文化交流活动,目的是与各国人民共度农历春节、共享中华文化、共建和谐世界。“欢乐春节”活动自从开办以来,国内外各界广泛参与,规模越来越大,反响越来越热烈。迄今为止,“欢乐春节”活动已经成功举办了六届,活动的规模、品质、层次、影响力等逐年提升,已成为我国对外文化交流最具影响力的品牌活动。

此外,我国政府有关部门组织的“中国文化年”、“中国文化节”、“中国文化月、文化周”等各种文化品牌活动遍及各大洲,吸引了社会各界的积极参与,成为我国与世界人民开展文化交流的重要渠道。

(三)坚持文化交流与文化贸易双轮驱动,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兼顾

在开展对外文化交流中,注重以友好交流和商业渠道两种方式运作,调动官方和民间两个体系,调动政府和市场两个体系,努力实现社会和经济效益双丰收。

当前急需解决的是提升对外文化贸易水平。现阶段,我国的对外文化贸易仍处于初级发展水平,除了品牌少、人才短缺等问题外,还存在着内容产品逆差严重、对外文化贸易占国

家对外贸易总量比重偏低、文化产品出口种类单一和文化产品出口地区过于集中等问题。

近年来,在发展对外文化贸易工作中,政府坚持发挥市场在文化资源配置中的积极作用,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坚持统筹协调,整合中央和地方文化创新资源,搭建文化贸易高端平台;坚持出口导向,促进文化创新成果产业化,全面提升文化创新能力;坚持开放合作,在更大范围、更广领域、更高层次上参与国际文化竞争与合作,不断提升我国文化软实力和产业竞争力。在政府的积极引导和大力扶持下,中国对外文化贸易取得较快进展,已经从单纯的文化产品走出去,发展到文化服务走出去,再升级到文化资本开始走出去,一批有实力的中国文化企业在国际市场崭露头角,通过联合制作、海外并购、筹建子公司等多种形式推动文化产品和服务的出口,同时将中国文化广为传播,文化影响力逐渐扩大。2011年起,国家陆续在北京、上海和深圳建立了3个对外文化贸易基地。北京、上海、深圳三地对外文化贸易基地的设立,构成了环渤海、长三角、珠三角三大外向型文化产业集聚区,完成了我国对外文化贸易的总体布局。

(四)“走出去”与“请进来”并重发展

在对外文化交流中,坚持兼收并蓄、为我所用,尊重各国文化独特性,倡导世界文化多样性,推动不同文化间平等对话、彼此欣赏,善于吸收世界优秀文明成果,在交流中博采众长,在合作中自我完善。因此,我们不仅仅看重我国的文化“走出去”,也同样看重把外国的文化“请进来”。

20多年来,由文化部联合相关部委和地方政府举办的“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相约北京联欢活动”、“亚洲艺术节”、“成都国际非物质文化遗产节”、“张家界国际乡村音乐周”、“北京国际音乐节”、“北京国际设计周”、“新疆国际民族舞蹈节”、“丝绸之路国际艺术节”、“中国国际钢琴比赛”、“中国国际声乐比赛”、“中国国际小提琴比赛”等具有国内外影响力的国际文化活动,已经成为我国地方文化发展的新亮点、新动力。这些品牌活动吸引了上亿中外民众参与,扩大了中外文化交流的领域、

范围和规模,有力地促进了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和文化繁荣,提升了地方的知名度,成功地塑造了文化中国的新形象。

(五)创新交流内容、形式和渠道,塑造新时期对外文化工作的新特色

在做好文化演出、展览等传统对外文化交流项目的同时,注重创新工作手段和方式,充分发挥文化软实力优势,扩大中国文化的国际影响。

比如,对外经济援助是我国外交工作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在新时期运用文化方式开展对外援助,是对外文化工作的创新之举。2013年,文化部以为缅甸办好第27届东南亚运动会开闭幕式提供技术支持为契机,尝试实施了首个大型文化软援助项目,获得了积极而深远的影响。作为中央在中缅关系关键时期做出的重要部署,该项目的受众范围和影响力都远远大于传统援外工程。中方帮助缅方举办了非常现代化的运动会开闭幕式,为此派出了实力雄厚的技术团队,最多时有300个中方专家在缅甸工作,在缅甸和东南亚引起巨大轰动。此举得到了缅甸政府和社会的高度评价和赞赏。

近年来,在对外文化工作中,逐步加强了中外思想文化领域的交流。2013年以来,文化部启动了汉学家交流项目,分别于2013年举办了“汉学家与中外文化交流”座谈会,2014年举办了“汉学与当代中国”座谈会,这两个活动在国内外产生了很大影响,为中外思想文化领域的对话和交流创建了新的平台。2014年7月和9月,分别举办了两期“青年汉学家研修计划”。“2014青年汉学家研修计划”是文化部和中国社会科学院首次举办的针对青年汉学家的项目,旨在通过邀请其来华研修,帮助他们更加客观、公正、深入地认识和研究中国,加深他们对中国文化的了解、理解与认同,建立与中国专家学者与学术研究机构联系,为汉学与中国研究提供便利和支持。

借助广大海内外传媒机构的力量和渠道,让独具魅力的中华文化插上国际传播的翅膀,使中国故事讲述得更生动、传播得更广泛、影响得更久远。2014年,文化部与探索公司合作拍摄纪录片《中国文化之旅》,这是探索公司旗

下的探索频道和旅游生活频道首次制作和播出中国文化题材大型系列纪录片。该片使用国际非虚构类节目通用的带入体验式制片方法,通过具有华裔血统的著名主持人丹尼丝·凯勒生动有趣的“寻根之旅”,向全球电视观众全面介绍中国文化在不同层面的传承、发展,以及与世界文化的交流、融合,充分体现中华文明开放、包容、改革、创新的传统特质和时代风尚。与探索公司合作摄制并播出中国文化题材纪录片是借助国际高端传媒平台向世界传播中国文化的一次创新性工作,将会在一定程度上满足国外民众希望更多了解中国文化的现实需求,也将会进一步推动中国文化与世界各国文化的交流与对话。

为更好地运用文化方式讲述中国故事,文化部于2015年启动了“中华文化讲堂”项目。此项目将吸纳社会中青年精英知识分子加入,请他们赴海外组织形式多样的“讲堂”活动,以深入浅出的方式、生动有趣的内容,向海外民众讲述中国故事,同时促进学界交流,使中外学者在交流中增进相互了解,为中国文化走出去打好思想基础。

三、思考和建议

回顾对外文化工作发展历程,中国今天的对外文化交流已有了质的飞越,中国的对外文化工作在国家对外事务中的角色也已不再是一个配角,其特点日益分明,作用更加凸显。为更好地发挥对外文化工作的积极作用,实施中华文化软实力的影响,需要我们不断地改进工作思路和方式,同时做好战略规划。为此,提出以下一些思考和建议:

第一,尽早出台国家对外文化战略。对外文化工作将是我国新时期的一项重大事业。为此,必须做好顶层设计,制定对外文化战略已成为当务之急。相关部门必须站在国家对外政策的高度,打破文化内容管理上的条块分割,步调一致,形成覆盖大文化范畴的对外文化战略。同时需要解决当前多以不公开文件管理对

外文化交流的问题,国家应加强对外文化工作的立法,使相关管理依法进行,管理透明化也有利于社会各界更好地参与到对外文化交流中来。

第二,从政府主导逐步向社会全面参与转变。当前的对外文化交流,官方主导色彩偏重。在交流规模偏小的时期,政府主导起到了积极引导作用,并逐步推动交流规模质量不断提高。在当今对外文化交流已进入井喷式发展的时期,政府主导作用应逐步淡化,需要由主导向引导转变,通过政策、资金等杠杆,鼓励、扶持社会机构和公民积极参与对外文化交流,使更多的文化从业者和社会各界成为我国对外文化交流的生力军。

第三,从表面热闹向深度交流发展。目前有不少交流项目还是停留在表面热闹的层面,比如许多晚会式的演出项目,这种项目不能真正代表我国的文化艺术水准,还有由中方花巨资在外举办应景式的演出展览活动,完全不考虑经济和社会效益,这些项目都是看重表面热闹,而对国外主流社会很难形成真正的文化影响力。政府应进一步加强引导,扶持鼓励有内涵深度的文化项目赴海外交流,提升交流的品质和效益。

第四,文化工作要内外兼修。我国文化要“走出去”,需要优秀的文化内容来支撑,国内文化的发展壮大是基础和保障。如果没有好的文化内容,文化走出去也必将是“无米之炊”。这是当前对外文化交流中面临的实际问题。必须要解决好国内文化发展中遇到的突出问题,如缺乏创意、缺少文艺精品等。这需要为文化发展提供更多扶持政策和良好的艺术创作环境。中国文化走出去不能老吃祖宗饭,因为只有当代文化才能说明当今的中国。因此只有当代艺术真正繁荣发展了,文化走出去才不仅有了资源保障,也才能走得脚踏实地。

责任编辑:云 尔

Economic Theory of Two Mechanisms in the Regulation—On the Relations between Market Determining and Government Regulation: *Decision of CCCPC on Some Major Issues Concerning Comprehensively Deepening the Reform* approved in the Third Plenary Session of the 18th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makes a significant change in the statement of relationship between market and government, proposing “to let the market play a decisive role in allocation of resources and to give better play of the role of government.” The statement meets the requirement of operation strategy, showing substantial differences in theory. The requirement of operation strategy refers to prevention of government intervention in the market’s fundamental role; the theoretical difference aims to clarify the basic role and the decisive role of the marke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government regulation and market determining is coordinative and mutual restraining. The two mechanisms together to regulate the economy means that the market determining runs through all processes of economic operation and restrained by government regulation. Meanwhile, the government regulation should properly handle the three basic relations: in the regulation method, the right mix of the direct and indirect regulation and control should be implemented; in the regulation space, the macro control should be based and the medial governance supplemented; and in the regulation time, the frequent specification should be based and the camera-control supplemented. (ZHANG Hong-ming)

How to Look On Village-level Collective Economy?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National Governance System and Capacity: Administrative villages are the grass roots of national governance system, which are key factor to determine national governance capacity. Village-level collective economy is the most important economic basis to guarantee the capacity. Among nationwide 6,130,000 administrative villages, 50% have no village-level collective economy, 21% have income less than 50,000 yuan, 9% between 50,000 to 100,000 yuan, only 2.6% over 1 million yuan. There are two different policy orientations of this economy: one is to focus on the reform of 3%–5% rich villages, and the other is to focus on developing 90% villages which have no village-level collective economy or have extremely frail one. These two policy orientations stem from different opinions to village-level collective economy. They have completely different effect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national governance system and capacity. (ZHOU Jian-ming)

Brief Analysis of China’s Foreign Cultural Strategies and Policies: Cultural exchange with foreign countries has played an increasingly important role in the national foreign affairs in the new century. The pattern of cultural exchange, which is “government coordination, social participation, simultaneous development of officials and civilians and market operation,” has been taken shape. Our work on the foreign culture has entered brand-new historical period, while foreign cultural strategies fail to occur with independent form and foreign cultural policies fail to form a complete system, which have negative influence on the management efficiency of cultural work. In order to give better play to the positive role of foreign cultural work and promote Chinese culture to go out, the top-level design must be completed as soon as possible and to make out the foreign cultural strategies has become urgent affair. (LIANG Bin)

Impel Common Prosperity to Achieve the Chinese Dream: Common prosperity is the dream of generations of Chinese people. Common prosperity need the material basis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material basis of common prosperity need to develop the productive forces and focus on efficiency through the rich first pushing those being rich later and cascade development. We must impel of common prosperity to achieve the Chinese dream, that is, after realizing the basic well-off society, we should pay more attention to social justice and make great efforts to narrow the gap. (LI Zhan-cai MA Xin)

The Influence of Rise in Resource Price on Benefit Distribution—the Perspective of Marxism Political Economy: In recent 20 years, resource price has constantly risen, and the benefit distribution share of resource owners has constantly increased. Under such a circumstance, Marxism political economy needs to be expanded and explored on the basis of rent theory. In this way, the price essence of natural resources can be more comprehensively and deeply analyzed and the reasons for rise in natural resources price and its influence on benefit distribution can be systematically revealed under the framework of Marxism theory. Based on this analysis, it is necessary to continue to insist and improve the state monopoly of mineral resources so that the differential rent of urban land is guaranteed to be owned by the public, to keep alert to the exorbitant benefits problems which occur in the development of real estate and rare natural resources, to impose proper restrictions on the development of some industries related with resource exploitation and preliminary working so as to mitigate the pressure of environment pollution, to guarantee the farmers’ interests, to devoted to stabilizing international resource market and to contribute to a global regulatory mechanism of resource utilization. (WANG Li-xin)

The Extension of “Two Kinds of Production” Theory and Its Implication to the Implementation of New Population Policy — Reinterpretation of Marxism “Two Kinds of Production” Theory: With the condition of people aging before getting rich, labor shortage, the problem of supporting old people faced by single-child families, *Decision of CCCPC on Some Major Issues Concerning Comprehensively Deepening the Reform* declares the major adjustment of population and childbearing policy and launches “selective two-child policy.” At present, the urgent problem, which is how to ensure the successful implementation of this policy and give it full play, needs to be addressed. Marxism “Two Kinds of Production” Theory is one of theories which point out the importance of human’s reproduction to human survival and development. Based on the extension of “Two Kinds of Production” Theory, the “human care” attribute of population policy must be paid attention to. Prospective and antecedent system must be established for new population policy. The